

经济与法·

我国债权人权利法律保护问题

王妍

(黑龙江大学 法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债权人权利的顺利实现是维护社会信用的基础, 由于债权本身的脆弱和转轨时期的混乱, 使债权较易受到伤害。我国现行的有关债权保护的法律制度是建立在将债务人假想成一个完美的道德主义者的基础之上的, 一旦债务人在道德上显得并不完美时, 法律为债权人提供的保护框架就会坍塌。在法律上加强、完善对债权的保护, 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

关键词: 债权; 法律保护; 有限责任制度; 撤销权

中图分类号: D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6X (2002) 01-0078-04

一、债权人权利需要加强保护的原因

债权作为一种一般的民事权利, 与其他的民事权利一样, 需要法律的维护与保障。但是, 债权又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其他的民事权利, 债权本身的性质、债权所处的时代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债权更需要法律的特殊保护。

1. 债权的性质决定了债权的弱势性

即债权能否顺利实现, 主动权主要掌握在债务人手中, 这是由债权的性质决定的。因为债权是一种相对权, 是一种请求权, 债权的实现不完全取决于债权人自身的努力, 债权人权利的实现必须依靠债务人的积极配合, 只有债务人积极的作为, 才能使债权人的权利得以顺利实现, 债务人的任何消极或逃避都会影响到债权人权利的实现。

2. 法律制度设计上的原因导致了债权的脆弱

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有其积极意义的同时, 也会有一些消极的作用。对债权人权利有不利影响的法律制度有很多, 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有限责任制度和诉讼时效制度。有限责任制度, 即投资人对所投资的主体——企业

(有法人资格的) 的债务只承担有限责任。在公司中, 一般是出资人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制度应该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伟大创举, 它解决了出资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问题, 但是, 任何一种情况下的有限责任制度都是以牺牲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公司的出资人可以利用有限责任制度来摆脱大量公司的债务, 公司债权人也因为有限责任的屏障不能直接向公司的出资人行使权利, 债权人的权利在有限责任制度面前已经大打折扣。诉讼时效制度也是如此, 因为诉讼时效是法律规定的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法定期限, 在此期限内, 如果权利人不行使权利, 则该权利不再受法律的保护, 即胜诉权消灭。在现实生活中, 债权人的权利因种种原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不胜枚举。有限责任制度和诉讼时效制度是司法实践中通用的法律制度, 这两种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使债权变得更加脆弱。

3. 转轨时期的混乱决定了债权的风险

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处于新旧交替时期, 经济秩序较为混乱, 正常的交易规则和交易秩

收稿日期: 2001-10-20

作者简介: 王妍 (1964-), 女, 黑龙江肇州县人, 法学硕士, 副教授。

序没有建立, 交易安全没有保障, 在此情况下, 债务人以各种方式和借口逃避债权人的债权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假破产真逃债、恶意剥离转移财产等时有发生, 正常的经济交往也履薄冰, 信用下降甚至崩溃。这种混乱的局面加大了债权的风险。据统计: “在发达市场经济中, 企业间的逾期应收帐款发生额约占贸易总额的 0.25%—0.5%, 而在我国这一比例高达 5% 以上, 且呈逐年增长势头”。^[1]

以上种种原因说明, 债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相比, 更脆弱, 更需要法律的特殊保护。

二、现行法律对债权人的保护及评价

信用的崩溃反证了法律制度的缺陷, 一个信用不发达的国家一定是法律制度不理想的国家。我国现行的有关债权保护的法律制度是建立在将债务人假想成一个完美的道德主义者的基础之上的。但是, 一旦债务人在道德上显得并不完美时, 法律为债权人设计的保护框架就会坍塌。

长期以来, 我国法律对债权人的保护处于弱势状态,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 颁布了一些法律、法规, 这些新的法律、法规确立了一些保护债权人的制度, 但是, 这些制度在具体运用上却存在着一些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很难解决债权人债权的危机。现行的关于债权人保护的制度, 较为突出的是《公司法》、《合同法》上的一些规定:

1. 公司合并、分立时的通知制度

《公司法》规定, 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在合并、分立时, 应在作出决议时起, 10 天内通知债权人, 30 天内在报纸上公告三次, 收到通知的债权人在 30 日内, 没有收到通知的债权人在第一次公告之日起 90 天内,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如果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公司不得合并、分立。

《公司法》的这一规定极大地防止了债务人(公司)利用公司的合并、分立来逃避债务的可能, 为债权人的债权在公司合并、分立中免受侵害提供了法律保护。但是, 《公司法》的这一规定过于笼统: 首先, 公司的债权人可能有很多, 如果对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债权人的债权不能清偿或提供担保, 而对大多数债权人的债权能够清偿或提供担保, 公司是否可以合

并或分立, 法律未做具体的规定; 其次, 如果公司在合并、分立时没有通知债权人, 但是该公司的合并或分立却得到了有关机关的批准, 那么, 公司的合并、分立是否有效; 再次, 公司在没有通知债权人的情况下合并或分立, 债权人得知后, 如何行使权利、如何进行补救。这些问题在公司法上均未做具体规定, 使本来很好的制度在具体应用上大打折扣。

2. 债权人的撤销权

《合同法》第 74 条第 1 款规定: “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 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 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 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 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这是《合同法》规定的债权人的撤销权。《合同法》的这一规定, 赋予了债权人在债务人有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时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债务人行为的权利, 这一规定对债权人权利的保护极为有利。但是, 该规定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也仍然存在着问题。首先, 债权人行使撤销权获得返还的财产, 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是否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合同法》没有明确规定, 一般认为, “行使撤销权所获的利益, 仍属债务人的全体债权人的担保财产”,^[2] “被撤销的行为所得的财产, 不是直接对债权人清偿, 而是作为对债务人的所有债权人的共同担保财产。”^[3] 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具体的债权人来讲, 行使撤销权所获得的利益就可能微乎其微, 既然没有直接的利益可图, 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 其次, 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是有时间限制的, 即 “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 该撤销权消灭。”《合同法》的这一规定在时间上限制了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 一年和五年的规定属于除斥期间, 除斥期间不存在中断、中止和延长的问题, 在除斥期间经过后, 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处分行为(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 不得再主张撤销。可见, 撤销权对债权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但也不是绝对的。

3. 债权人的代位权

《合同法》第 73 条第 1 款规定: “因债务

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这是《合同法》规定的债权人的代位权,它与债权人的撤销权共同构成了债的保全制度。债权人的代位权解决了债务人消极行使权利,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问题,但是,代位权行使的结果仍然是所得利益不能单纯的用于清偿自己的债权,而应属于债务人的所有债权人的共同担保财产,即仍然存在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积极性问题;同时,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前提是要对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的事实进行举证,在企业对商业秘密较为注重的今天,债权人要做到这一点也许不会太容易。

我国关于保护债权人权利的规定还有很多,但是,对债权保护真正能够起到作用的不多。虽然我们不知道对债权的保护和对信用的维护决不仅仅是法律所能够担当的,但是,法律在其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综观我国现有的法律,有关债权保护的法律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只有单行法中略有规定,调整民事关系、保护民事权利的基本法律规范——《民法通则》对此没有直接的规定;(2)只有零星的规定,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保护体系;(3)只有原则性的规定,缺乏灵活性的运用。

三、加强、完善我国债权保护制度

法律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身份到契约、再从契约到身份的过程。英国历史学家亨利梅因在1883年说:“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这个发展着的社会运动始终是一种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于人的身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于他们之间的约定。当历史推演到20世纪中期,梅因的上述论断被美国学者伯纳德施瓦茨修正了。在施瓦茨看来,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本世纪中期,社会的运动已经重新转变为“从契约到身份”的运动。在当代社会,工人由于其身份而受到“工人赔偿法”的保护,消费者由于其身份而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的保护。总之,在当代社会,法律的目标已经从强调保护私有财产和契约自由转变为实现个人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在当代美国合同法中,为交易的

弱方提供特别的法律保护,已成为一项贯彻始终的政策。^[4]从身份角度对某类主体进行特殊的法律保护,是现代社会激烈、残酷竞争的需要,债权人在现今时代的我国,应该说是一类分散、弱勢的群体,对其进行特殊的法律保护,符合法律发展的基本趋势。

我国债权人权利保护的危机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法律制度存在缺陷应该说是其主要原因。笔者认为,完善、加强债权人权利的保护,下列一些制度应重新思考和设计。

1. 企业设立时的真实责任

企业设立是否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注册资本是否真实,是保证债权人权利实现的基础性前提。在我国,企业设立有的采用准则主义,有的实行核准主义,但是,无论采用哪一种原则,登记都是必经程序。任何企业的设立都必须经工商机关核准登记,只有依法登记才能取得合法的经营资格。我国工商机关对企业登记申请进行审查,审查的原则实行的是实质审查制,即登记机关不但要对申请企业提交的申请文件进行形式上的审查,而且还要对文件所涉及的内容是否真实、合法、有效等问题进行实质审查。只有申请条件真实、合法、有效才能核准注册。但是,工商机关在对企业登记申请进行审查时,这种实质审查往往流于形式,虚假出资、注册资本不实等问题时有发生,这些都构成了对债权人潜在的威胁。因此,在企业登记过程中,应真正贯彻实质审查制,加强对登记企业的实质审查,避免不具备条件的企业取得合法的经营资格;同时,应加强虚假登记的惩罚力度,必要时应设立登记担保制,使企业设立时能够真正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

2. 有限责任制度之反思

以牺牲债权人利益为代价换取的有限责任制度,近年来多方面受到抨击。不能否认,有限责任制度在刺激投资、加强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对债权人来讲确实不够公平。一般情况下,投资者投资设立企业,具备法人条件的可以依法取得法人资格,按法律的规定,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如果企业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其所欠的债务,投资人也没有清偿的义务,投资人的这种有限责任,使投资

人的财产与企业的财产分离开来,也使企业的责任与投资人的责任相分离。这样,投资者就可以利用有限责任制度来逃避债务或损害债权人利益。为了打击日益猖獗的这种行为,英美法系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创设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大陆法系国家称为“直索”),即如果投资人利用有限责任制度,故意损害债权人的利益,那么,将在个案中暂时否认企业独立的法人资格,使债权人能够向企业的出资人直接行使追索权,迫使投资人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弥补了有限责任制度的不足,对出资人利用有限责任制度逃避债务的行为进行了限制和打击。但是,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引进“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如何避免投资人利用有限责任制度损害债权人利益就成了法学理论较为关注的问题。

3. 债务人申请破产之补救

我国破产法规定,债务人和债权人均有权申请破产。债务人申请破产是法律赋予债务人的一种特权,因为在一般民事诉讼程序上,债务人不能对自己提起诉讼。法律之所以规定债务人可以对自己提出破产申请,是因为债务人较为了解自己的资产负债情况,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下,及时提出破产申请,能够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但是,法律赋予债务人的这种特权,在现实生活中,被债务人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利用,负债累累的债务人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主动申请破产,借以摆脱掉沉重的债务负担,因此,在我国破产案件中,债务人申请破产在比例上占了绝大多数。债务人的这种行为无疑会严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法律上如何进行补救,国外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首先,是规定债务人有申请破产义务,而不是有申请破产的权利。因为规定其有申请破产的义务意味着其一旦达到了法律规定的界限就必须主动申请破产,避免其将财产消耗殆尽时再申请破产,这样可以较好地保护债权人;其次,全面规定破产犯罪问题。国外有关破产犯罪的规定有很多,如欺诈破产罪、过失破产罪、破产贿赂罪、违反破产义务罪等,这些规定有效

抑制了利用破产达到不法目的的可能。我国破产法和刑法中没有破产犯罪的具体规定,使债务人可以有恃无恐的进行“假破产真逃债”,因此,应加强破产犯罪的规定,避免利用破产制度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4. 债权担保、救济制度之加强

债权担保制度是保护债权人权利的事先防御手段,《担保法》全面规定了债的担保制度,但是,《担保法》在实际运用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如保证人保证责任的落实、抵押物重复抵押等,担保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会对债权人权利的实现构成威胁。应从保护债权人的角度加强债的担保的效力:对于保证人的保证,主要应加强对保证人的资信审查和保证期间保证人财产运用情况的监督,避免保证责任发生时,保证人的财产“一无所有”;对于抵押担保,应加强物权公示制度,使设定在担保物上的权利明确、具体、单一。

债权的救济制度主要是指在债权受到侵害时,法律对债权人提供的保护。我国债权救济制度中,较为薄弱的环节是强制执行环节。当债权人的债权得到了法律的确认并需要对债务人进行强制执行时,所遇到的障碍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所能理解的程度,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受到了挑战。因此,加强强制执行的力度是保护债权人权利实现的有效手段。

对债权人权利进行有效的法律保护,需要加强和完善的法律制度还有很多,但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讲,债权人权利的保护问题,都是当今中国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骨龙. 中国社会的三大污染[J]. 南风窗, 2000, (10).
- [2] 李国光. 合同法释解与适用[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
- [3] 江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 [4] 王军. 美国合同法判例选评[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责任编辑:于振荣)